

當

代 想 思 人 物 系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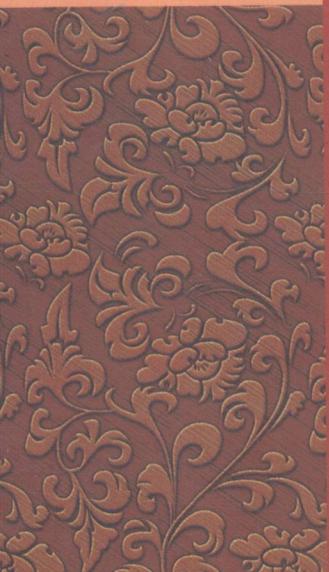
五四後

人物·思想論叢集

著者◎

劉笑敢 · 金春峯

方仁念 · 胡平



五四後人物、 思想論集

當代思想人物系列

著者◎劉笑敢·金春峰
方仁念·胡平



808136

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劉笑敢等著。-- 臺初

版。-- 臺北市：正中，民85

面；公分。-- (當代思想人物系列)

ISBN 957-09-1053-4(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現代(1900-) - 論文，
講詞等

112.8

85003828

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當代思想人物系列》

著者：劉笑敢・金春峰・方仁念・胡平

發行人：武奎煜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

台北地址：台北市衡陽路 20 號

台北電話：(02) 3822815・3821496

郵政劃撥：0009914-5

FAX NO：(02) 3822805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臺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9473)

分類號碼：112.00.003(版)(5.40)(2,000)新

ISBN 957-09-1053-4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FAX NO: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03) 32914344・FAX NO: (03) 2914345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曼谷耀華力路 233 號

電話：2226573・FAX NO:2235483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 Kissena Boulevard, Flushing,

N.Y.11355 U.S.A.

電話：(718)7628889・FAX NO:(718)7628889

歐洲：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V 7LJ

電話：(0171)4398825・FAX NO:(0171)4391183

定 價：三〇〇元

序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近幾年來推動著幾項集體研究計畫，其中的一個重要專題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本書即其成果的一部分。四位作者的學術專業不同，但都熟悉近四十餘年來大陸的思想狀態，故能各就平時研讀領域發揮所長，寫成專篇。這些深入淺出的研究報告使在大陸以外的讀者對中共統治下的思想變遷可以有一個較為親切的認識，這是我們必須感謝本書四位作者的，這四位作者雖然都來自大陸，但是他們早在大陸時代便已開始發展了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態度。這幾年來，流寓美國，他們又接觸到自由世界的種種思潮和知識，眼界更為開闊。因此他們在這些文章中所流露的鮮明論點已遠超出馬列主義的框架。他們的反思達到了「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的境界，故尤為難能可貴。

八〇年代以前，中國大陸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自由世界的學人論述大陸思想，無論是贊美或貶斥，大致都免不了情感的蒙蔽，贊美者固然膚淺，貶斥者也是隔靴搔癢。八〇年代以後，由於開放政策的效果，大陸的學術思想界對於外

面的觀察者已失去其神祕的性質，直接而比較客觀的理解自然是可能的了。然而外在觀察者畢竟缺少真實生活上的體驗，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內在觀察者不斷提供關鍵性的論點，使生活在另一世界的人可以懂得這些思想變化在日常人生方面有什麼具體的根據。唯有如此，現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才是活的學問，而不致流為紙上的死物。我認為這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我很慚愧，不能對本書的具體內容作一番鉤玄提要的工夫，以為讀者之一助。

這是因為我從來沒有系統地研究過現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變遷史。無論是關於毛澤東、魯迅或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問題，大陸上所發表的文獻都可以用「汗牛充棟」四個字來形容。我既沒有掌握住這些基本文獻，現代的學術訓練便不允許我在這些問題上隨便發言。我雖然讀過毛澤東、魯迅、馮友蘭的文字，並且也偶有論述，但是我的立論根據不是過去四十多年的大陸生活經驗，而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專業。本書的四位作者在生活經驗之外還熟悉有關論題的大量資料，這就更是我這個行外的人所敢妄加衡斷的了。為了盡作序者的義務，下面我將簡單說幾句有關本書所處理的時代在整個中國近代和現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本書雖以「五四」人物為中心，但重心偏置在「五四」的破壞性、否定性的

一系，即以魯迅和毛澤東為代表的「五四」左翼。「五四」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個真正的「百家爭鳴」的時代，不但西方的各派思想都有人介紹和鼓吹，中國舊有的諸子百家以及佛教諸宗也都有人從現代的觀點重新闡釋。在這樣一個自由活潑的空氣中，破壞性、否定性的思潮也自有其清宮除道的積極作用。這股否定性思潮在一九一九年以後匯流於馬克思主義之中，但即使如此，在當時「百家爭鳴」的局面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和傳佈也只是豐富了中國現代思想的內涵，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事。後來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暴力相結合，造成了中國的悲劇，則是種種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因素有以致之，也未可全歸其惡於馬克思主義的本身。

馬克思主義源於西方，在西歐與北美各國都有廣泛的流佈。以亞洲而言，日本則是它植根最深的國家。但是它在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破壞社會細胞的災害。由此可見，凡是政治、社會、文化比較健康的國家，馬克思主義只能作為一個思想流派而存在，絕無翻天覆地的神通。

我並不以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它在「五四」時期為少數知識分子所接受，毋寧是十分自然的。我感到驚訝的倒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為什麼那麼多的「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會死心塌地承認馬克思主義為

「絕對真理」，並且那樣認真地努力從靈魂深處「改造」自己的思想，以求合於官方的意識形態？舉其較著名的而言，如金岳霖、朱光潛、賀麟，以及本書論及的馮友蘭等人都是在中西哲學方面有很高造詣的學人。但他們在中共政權的面前，一個個都變成了甘心認罪的「思想囚犯」，而且不惜以各種不堪的懺悔方式作踐自己過去辛勤獲得的學術成就。我們最初以為他們是被迫出此，尚不免為之惋惜。現在我們知道，他們真是從心底承認自己是全錯了。這是現代中國思想史上最難索解的一頁。

「五四」以反孔家店的「名教」始，而以尊奉馬家店的「新名教」終，中國知識分子能作這樣大幅度的思想轉變而不失其怡然自得的故態，這說明中國文化心理的結構是最值得研究的課題。我仍然親切地記得，遲至一九四八年，在政治上活躍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教授、作家、新聞記者、到大學生，人人都在爭取「民主」、「自由」、「個人自主」這些基本的現代價值，但是一年之後，他們便都毫不遲疑地跟著毛澤東痛斥「民主個人主義者」了。即以毛澤東本人而言，他在「五四」時期也是極端歌頌「自由」的，他不是寫過「萬物霜天競自由」的詞句嗎？為什麼大權在握之後，他只許自己有絕對的個人自由，而不惜摧毀一切其他

個人——包括他的「同志」——的自由了呢？所以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中國大陸上的一切思想和精神的資源都被冷藏起來了，剩下來的只有少數教條和口號。甚至馬克思主義也空存其名而已。覺醒了的共產黨員想恢復一點長久被壓抑的人性也只有從馬克思早期手稿中去尋找一些突破口。所以「人道主義」、「異化」等問題的提出當時才能震動一世。在中國文化史上，一九四九—一九這三十年大概是「思想貧困」的顛峯時代吧！

這三十年的思想史雖然走的是一條越來越貧乏的下坡路，但是作為研究的對象，它所蘊藏的可能性則是極其豐富的。我盼望本書的四位作者能繼續努力下去，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段奇異的歷史作深入的發掘，使後人能理解為什麼中華民族竟走進這一段崎嶇艱險的道路。杜牧之〈阿房宮賦〉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只有認真領取歷史的教訓，「後人復哀後人」的悲劇才不致於重複上演。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余英時序於普林斯頓

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

【目錄】

1	孫中山——熱中建設的革命家	1
2	毛澤東——崇尚革命的開國人	23
3	毛澤東與孫中山——關於革命與建設	
4	論魯迅的美學思想	73
	——兼評《魯迅美學思想論稿》	
5	彷徨時期魯迅思想新論	117
	——兼評「中間物意識論」	
6	馮友蘭先生批孔的前前後後及其教訓	167
	——兼論「新理學」體系非新儒學思想	
7	周揚與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233

◎方仁念

◎金春峰

◎金春峰

◎金春峰

◎劉笑敢

◎劉笑敢

8 王若水與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277

◎方仁念

9 人道主義及相關思潮在當代中國的命運

321

(一九四九—一九六二)

10 人道主義及相關思潮在當代中國的命運

375

(一九七六—一九八四)

11 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再討論

425

◎胡平

1 热中建設的革命家

孫中山

劉笑敢

一九四七年生於河南省。一九六六年在天津高中畢業，躬逢「文革」盛世，有幸到內蒙古大草原務農、上學、任教，凡十年。一九八一年獲北京大學碩士學位，到中華書局任編輯，一九八五年獲北大博士學位，留校任講師、副教授，講授有關中國哲學史課程。一九八八年赴美遊學，先後在密西根大學中國中心，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東亞系、世界宗教中心，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宗教系、中國學社任研究員、講師、訪問學者，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講師，講授有關中國古代及近代的哲學和思想等課程。近年來主要從事老莊思想及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問題的研究和寫作。主要著作包括《莊子哲學及其演變》、《莊子哲學》（韓文）、《Classifying the Zhuangzi Chapters》、《Our Religions》（合作）、《兩種自由的追求—莊子與沙特》、《兩極化與分寸感—近代中國精英思潮的病態心理分析》等。

海內外對於孫中山的研究著作已經很多了。台灣方面自不待言，英文著作也很多，不少西方學者是以孫中山的研究著作而成名的。近十幾年來，大陸對孫中山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本文不準備重複任何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從特定的角度來分析孫中山與其他政治人物不同的一个特點，那就是他在鼓動革命的同時對建設也特別重視和強調。

主張「建設」與「革命」密切相連，認為「建設」比「破壞」更重要、更根本，這是孫中山思想性格的一個重要特點。如果這一思想觀點發生在一個普通人或一個理論家身上，那就沒有什麼特殊，但是這一思想卻發生在作為革命家的孫中山身上，那就特別值得注意，世界上很少有一個革命家像孫中山這樣既熱中於憲政建設，又熱中於實業建設。

筆者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來源於在中國大陸四十年的生活經驗。中國大陸的當代歷史一直是政治鬥爭不斷的歷史，這大大延宕了中國建設的速度。在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的大背景下看孫中山對革命與建設的觀點就有特殊的意義。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近十幾年改革開放的背景下看孫中山對革命之建設的熱忱和設想，就更有現實的價值。在這方面孫中山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是值得重視的。

為革命建設設計革命方略

孫中山是以革命著稱於世的。這革命二字還是受了日本報紙的啟發。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孫中山和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逃往日本，船過神戶時，三人上岸買了一份日文報紙，發現一條新聞是「支那革命首領孫逸仙抵日」，孫中山說：「革命二字出自《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一）孫中山雖然很欣賞革命二字，但是他作為革命家卻十分重視建設。世界上的革命家、政治家中很少有人像孫中山那樣強調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革命成功以前就為憲政建設和實業建設而熱血激情，孜孜不倦，奔走不已。孫中山是一個在動盪的中國熱中於和平建設的革命家。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所擬定的革命方略就突出了建設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他把革命分為三個時期，即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這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的設計，卻仍然體現了他以正面建設為中心的革命目的。

第一，在軍政時期實行軍法，為破壞時期，以革命軍打破清朝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解脫奴婢之不平，洗淨鴉片之流毒，破除風水之迷信，廢除釐卡之阻礙等。孫中山的破壞目標主要是清朝的專制統

治和惡劣的社會習俗，而沒有整個的敵對階級或敵對的營壘。這就決定了他的革命破壞不會擴大化，不會主動樹敵，但是也帶來了所謂革命不夠徹底的問題。

第二，在訓政時期實行約法，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按照孫中山的設想，這一時期，各縣都要在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即頒布約法，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和革命政府的統治權。三年以內由人民自行選舉縣官，形成自治團體。革命政府只能按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全國平定六年以後，由各縣的代表組成國民大會，制定五權憲法。當憲法制定，總統、議員選出後，訓政時期即告結束，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之總統。孫中山的這種設想相當理想，但實現起來相當困難，關鍵是有實權或有野心的政治人物不願意真正實行民選的自治原則，多數群衆的參政意願和能力還有問題。但是，這顯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在辛亥革命前後，地方自治在精英人物中似乎是很普遍的，毛澤東也曾經主張湖南自治，成立湖南共和國。(一)

第三，在憲政時期即建設完成時期，開始實行憲政，人民在一縣之內實行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在全國則行使選舉權，選出國民大會代表作為最高權力機關。「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二)革命的成功是以建設的完成為標誌的。沒有建設的完成，就談不上革命的成功。

從以上三個時期的設計不難看出，孫中山的革命是包括建設的。在孫中

山所設想的革命的三個步驟中只有軍政時期是破壞性的，破壞對象也只限於清朝之專制、官僚之腐敗、奴婢之不平、鴉片之流毒等具體問題，絕不是全面地掃蕩舊社會的一切「污泥濁水」或「殘渣餘孽」。而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就都是以建設地方自治和五權憲法為目的。

由於袁世凱的野心和權勢很大，而革命黨人的力量相當薄弱，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方略在孫中山的有生之年沒有得到貫徹。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似乎孫中山的失敗說明他的理論不合實際，因而是錯誤的。但是，這樣的推論也很有問題，因為在某個時期成功的未必是正確的，而不成功的也不一定就是錯誤的。比如暴君的統治可能維持很久，然而這並不能說明暴政是正義的；而對暴政反抗的結局可能是失敗的，這也不能說明反抗暴政就完全是錯誤的。人們判斷正確與錯誤應該有自己的理論標準和道德標準，不能完全以事實的結局為標準。歷史發展的結果是由衆多因素決定的，不可能完全按照一部分人的理論和道德進行，因而，某事發展的結果並不能充分說明某種理論、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是否正確或合乎正義。歷史事實的發展可能與人們的主觀標準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這一時期看起來成功的事，在另一個時期看來則可能是失敗的，無論成功與失敗都不能作為理論標準或道德標準是否正確的唯一根據。如果我們處處以實際發生的結果為唯一正確的標準，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有任何嚴肅的理論和道德原則，人類就只能在已經發生的事實後面亦步亦趨，成為事實的奴隸。當然，這也不是說，

不應該以實踐為真理的標準，只是這一標準的運用不可能是無條件的，也要有一定的原則，不能簡單就一件事來宣布實踐檢驗的結果，比如，不能以成功地殺人來證明殺人是正確的。

換一個角度來看，孫中山的三個時期的設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失敗的。他有生之年雖然未能看到訓政和憲政的實現，但是，國民黨最終還是在台灣實行了憲政，雖然晚了許多，範圍小了許多，實行的情況也不能讓人完全滿意，但畢竟是沿著軍政、訓政、憲政的階段走過來了。這樣看來，歷史本身也沒有完全否定孫中山的理論。

不過，本文基本上是思想和理論的分析研究，而不是事實的分析和歷史評價，因而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孫中山的理論是否正確，而是孫中山在革命和建設方面的思想性格和理論傾向，因此，我們所要強調的僅僅是孫中山的革命方略不僅包括憲政建設，而且是以建設為主體，以建設為目的的。事實上，孫中山的革命方略也就是建設方略。他說「予之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四)為「革命建設」制定「革命方略」，可見在孫中山思想中，革命與建設的關係一開始就是幾為一體，密不可分。這一點和一般革命者或造反者在成功以前一心只想打天下、坐天下，全然不考慮如何建設是根本不同的。

民國急需革命之建設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按照孫中山的革命方略，應該開始革命建設，但是，由於革命黨人對於革命後掌握權力、進行建設準備不足，革命建設遲遲不能展開。為此孫中山倍感挫折，極為焦慮。這一點在他的《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中有系統的表述。《孫文學說》的中心思想即革命之破壞已成功，而革命之建設尚未就緒，因而要糾正革命黨人對建設的畏難情緒，糾正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思想。他在《孫文學說·自序》中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說法是「予生平最大敵也」，「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⑤這是孫中山創立「知難行易」說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孫文學說》反覆論證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要鼓舞革命黨和人民拋開各種顧慮，積極進行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也就是盡快興建大港口、鐵路網和各種工業，盡快推廣民主憲政。

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局勢的發展是孫中山或任何人都完全無法控制的，其原因相當複雜。孫中山把「革命之建設」不能實行的原因